

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评析

[韩] 朱宰佑

内容摘要：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由“迫使朝鲜变化”与“为统一做准备”两部分构成，虽重视推进南北关系改善，但李明博上台后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和危机影响了这种努力。“天安舰”和延坪岛炮击等事件极大影响了韩国国民的安保观、统一观、对朝援助观等。在对朝政策方面，韩国政府与国民之间存在沟通问题。朝鲜的挑衅导致南北爆发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李明博政府政治上需要继续维持对朝强硬政策，与此同时却要给国内高涨的“武力反朝”情绪“灭火”，这将是一个两难。

关键词：李明博政府 韩朝关系 对朝政策

2011年是李明博总统入主青瓦台的第四年。在过去三年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基调是通过“坚持原则”的交流与协商来解决半岛问题和朝鲜问题，以实现和平共存、共同发展的夙愿。虽然李明博政府一直积极推动召开南北会谈，努力改善南北关系。但是，由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南北关系在2008年和2010年陷入僵局，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也由此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连续性，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姿态和立场。那么在当前情况下，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能否奏效倍受瞩目。

一、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基调

2008年2月上台的李明博政府将建设“先进化的世界一流国家”作为国家发展目标，希望能发展面向未来的南北关系；构筑以共同价值与利益、相互信任

[韩] 朱宰佑 韩国庆熙大学外交政策教授。

为基础的21世纪韩美战略同盟；推进能够确保经济增长的实用外交和国际合作；建立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安保体系。

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李明博政府将安保政策的重中之重放在加强韩美同盟上。在2008年4月18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中，两国总统就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21世纪战略同盟”达成共识，从而使处于危机之中的韩美同盟重新走上正常轨道。此后，两国在安保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发展。在2009年11月召开的韩美首脑会谈中，李明博和奥巴马再次确认两国要建立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牢固安保态势，¹并就在2010年召开韩美同盟史上首次“2+2”会谈达成协议。除了军事领域议题，“2+2”会谈还将就两国同盟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所有待解决问题、朝核问题及地区安保局势等进行磋商。“2+2”会谈这种形式本身就意味着韩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被视为韩美同盟关系质的飞跃。²

李明博政府上台之初，提出旨在推动朝鲜弃核、发展建设性的南北关系、相互尊重、进行对话的“无核·开放·3000”构想。同时，强调全面调整此前两次南北首脑会谈中商定的南北交流方式和优先顺序，重点放在交流合作的透明性上。2009年后，李明博政府进一步阐明其对朝政策是在“相生共荣”的基本原则下推进“无核·开放·3000”构想，即朝鲜先在无核化、改革和开放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后，韩国再给予朝鲜相应的援助。

但是，由于该构想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李明博政府进而提出了“相生共荣”政策，以期对其初期的对朝政策进行修正和完善。此后，李明博政府还在2010年的“8·15”庆典演说中提出了和平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民族共同体“三阶段统一政策构想”，并通过统一部在2010年政府部门会议中提交的2011年政策及计划报告，正式确定了这项统一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现政府将之前的南北关系视为不正确的关系，力图纠偏，通过发表统一准备计划，揭示了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由“迫使朝鲜变化”与“为统一做准备”两部分构成。

韩国历届政府的统一政策基本上包含四种途径：一是通过民主程序推进和平统一；二是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统一；三

韩国历届政府的统一政策基本上包含四种途径：一是通过民主程序推进和平统一；二是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统一；三是通过和解合作实现南北联合，进而建立统一国家；四是设定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目标，稳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实现制度性统一。

1 比如，在2009年10月召开的第41次韩美年度安保协议会（SCM）上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将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延伸遏制力”概念具体化为核力量、常规武器力量以及导弹防御体系（MD）这三种手段，并落实到文字中，即一旦捕捉到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征兆，美国将迅速在朝鲜半岛部署搭载核武器的航空器和潜水艇、舰空母舰以及常规武器战斗力，在朝鲜发动挑衅之前就予以遏制；一旦发现朝鲜使用核武器，就将对朝鲜的核设施和军事设施实施精密打击。

2 具本鹤：“李明博政府中间评价与今后课题”，载《韩国政策》（Korea Policy），第4号，2011年1/2月，第11页。

是通过和解合作实现南北联合,进而建立统一国家;四是设定形成民族共同体的目标,稳步推进经济、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实现制度性统一。制度、领土、货币的统一固然重要,但统一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社会融合的“人的统一”和“心灵的统一”,也就是内在的交融。

值得指出的是,在与国民加强沟通取得共识方面,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尚有很多不足之处。考虑到南北关系的特点以及朝鲜的对韩战略,对朝政策不仅仅是针对朝鲜实施的政策,也包含了针对韩国国民所采取的措施,但后者这些没有充分反映在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中。同时,对于“天安舰”事件等类似突发事件,李明博当前政府的预防与应对体系也比较脆弱。

李明博政府宣布2011年为“统一元年”,这体现了韩国致力于改善对朝关系的意志。而与此同时,朝鲜在2011年伊始,也接连展开全方位的对南对话攻势。据此,2011年有望成为检验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效能的一年。

二、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方向

李明博政府在对朝政策中强调“坚持原则”,而且致力于强化韩美同盟关系,这给外界留下李明博政府不重视改善南北关系的印象。但是,从召开南北实务会谈的次数和频度上看,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表1所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南北首脑会谈、实务会谈的总次数为233次,李明博政府时期的会谈次数为22次,约占10%。

表1 1971—2011年南北首脑会谈及实务会谈召开情况

期间(年)	会谈召开次数(回)	年平均会谈次数	备注
1971—1980	121	12.1	
1981—1990	78	7.8	1981—1983年没有召开会谈
1991—2000	175	17.5	1996年没有召开会谈
2001—2011	233	23.3	

来源:韩国统一部网站资料室,“南北实务会谈”(http:unikorea.go.kr)。

考虑到李明博政府的任期还有两年,加之“天安舰”、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因素,李明博政府期间的南北会谈次数并不算少,推动召开南北会谈所付出的努力也并不比历届政府少,甚至还大大超过冷战时期的全斗焕政府(32次)或是后冷战时期的金泳三政府(28次)(表2)。可以说,李明博政府一直积极推动召开

南北会谈。¹

表2 韩国历届总统召开南北会谈的次数

总统	时间(年)	会谈召开次数(回)	备注
朴正熙	1971—1979	111	1976年没有召开会谈。1971年之前没有召开会谈。
全斗焕	1980—1987	32	1981—1983年没有召开会谈
卢泰愚	1988—1992	163	
金泳三	1993—1997	28	1996年没有召开会谈
金大中	1998—2002	80	2000年南北首脑会谈
卢武铉	2003—2007	171	2007年南北首脑会谈
李明博	2008—2011年3月	22	

来源：韩国统一部网站资料室，“南北实务会谈”(<http://unikorea.go.kr>)。

造成李明博政府为推动南北会谈所付出的努力往往被国内外专家或舆论所忽视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稀释了它为推动召开南北会谈所付出的努力。李明博政府上台后不久，韩美“牛肉风波”愈演愈烈，在进口美国牛肉问题上遭到全体国民的抵制，爆发了全国性的“牛肉烛光示威”，并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其后又发生金刚山游客被袭死亡事件（2008年7月）、朝鲜实施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观光事业、限制出入等“12·1”措施²（2008年12月）、朝鲜扣留美国女记者及开城工业园区职员事件（2009年1月、3月）、大青岛海战（2009年11月），“天安舰”事件（2010年3月）³和延坪岛事件（2010年11月），等等。其次，李明博政府坚持“有原则的”对朝政策，在对朝援助问题上坚持“相互主义”原则，这些作为对朝施压手段的政策，导致

1 <http://dialogue.unikorea.go.kr/talk/yearlyinfo/list>.

2 “12·1”措施指朝鲜针对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而相应采取的超强硬措施。作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应对措施，朝鲜的第一阶段措施为中断南北关系。这一措施的背景为，南北往来需要双方的相互通报与批准，为提高效率，朝鲜以军事通信线老化为由要求韩国向其提供通信线等各种装备和材料，韩国于2007年年末开始正式向朝鲜提供。但由于2008年7月11日金刚山游客被击死亡事件，韩国全面中断提供上述物资，朝鲜随之宣布实施“12·1”措施。参见“对朝提供军事通信装备的背景”，韩国联合通讯社，2009年10月21日。“12·1”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大幅减少京义线陆路日常通行次数，限制每日京义线陆路通行人数为750名，限制金刚山东海线陆路通行行为每周仅一次往返。另外，将开城工业园区常驻人员由3000余名减少至880名，并中断开城观光和南北京义线铁路运行、开城南北经济合作协议事务所。同时还原则上中断为进行各种交流合作和经济往来所必需的陆路通行。参见“‘12·1’措施一年”，韩国联合通讯社，2009年11月25日。

3 之后，韩国发布“5·24”措施。其内容包括：禁止朝鲜船只通过济州海峡、中断南北贸易、禁止与朝鲜居民进行接触、重启对朝心理战，并开展大规模的韩美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了南北关系的发展陷入困境。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李明博总统在2011年3月1日发表的“三一节纪念演说”中提出,“采取对武力挑衅行为负责任的措施,走向真正和解与对话之路。想要进行对话就要显示出诚意”。此番言论的语气与内容较前相比都有所缓和,体现出一种灵活性。比如,之前,李明博曾在2月1日南北军事实务会谈之前召开的新年广播座谈会上强硬地向朝鲜施压,表示“只有朝鲜做出改变,才能取得成果”。

三、朝鲜半岛战争的风险评估

当前韩国的国民舆论日益主张对朝鲜动武,这一方面与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所实行的对朝强硬政策有关;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发生的“天安舰”、延坪岛炮击、朝鲜核武等事件刺激了韩国国内的“反朝”情绪。

当前韩国的国民舆论日益主张对朝鲜动武,这一方面与李明博政府上台后所实行的对朝强硬政策有关;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发生的“天安舰”、延坪岛炮击、朝鲜核武等事件刺激了韩国国内的“反朝”情绪。

特别是“天安舰”与延坪岛事件之后,韩国国民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其原因在于韩国政府对事件的应对方式以及处理结果始终不能满足国民的期待。韩国国民希望对朝鲜的军事挑衅进行即时、有效的反击,而在事件后续处理过程中则希望政府能拿出化解与朝鲜对立、对峙局面的有效方案。韩国国民已经开始认为,是政府立足于“原则”的对朝强硬政策导致韩朝对峙局面的延续;在对朝政策上,政府与国民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

韩国国民不安全感的增强带来了对政府信任感的丧失,李明博政府不愿了解韩国国民在对朝关系上的真正需求到底是什么。韩国国民对政府的期望是,减少朝鲜半岛不稳定因素,实现和平。韩国国民更加倾向的国防观是:通过统一保障朝鲜半岛的安全,通过有条件的对朝援助降低朝鲜挑衅的可能性,以韩国自身的力量来确保自身的安保。

第一,韩国国民至今还对朝鲜挑衅的可能性与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韩国统计厅的调查(2010年5月17日至29日)结果显示,28.8%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安保问题(战争、朝核问题)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其次是犯罪(21.2%)、经济不稳定(15.4%)因素。这一调查结果反映了“天安舰”事件给韩国民众心理带来的影响。¹东亚研究院(EAI)自2000年以来实施的安保意识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11月,韩国国民对安保状况的担忧达到了最高点。2000年第一次南北首脑会谈时只有18.9%的受访者为安保状况感到担忧,李明博

¹ “国家安保是最大的不安因素”,载《京乡新闻》,2010年10月26日。

政府上台后(2009年3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就达到了59.2%,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则高达81.5%。韩国国民希望政府能够在2011年致力于改善南北关系。

第二,韩国国民安保担忧的增强,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政府应对与处理事件方式的不信任感。韩国国民对政府在朝鲜发动挑衅时没能立即采取适当的报复性措施而感到失望,而之后李明博政府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坚定与无能,让韩国国民更加对其不信任。文化体育观光部在“天安舰”事件一周年之际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80%的韩国国民认为“天安舰”事件是朝鲜所为,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9月实施的类似调查(72.6%)。而认为“为重启六方会谈或进行南北对话,朝鲜应该先就‘天安舰’事件进行正式道歉”的受访者多达65%,几乎是认为“即使不道歉也可以推进对话”的受访者的两倍(32.8%)。对于“如何看待当前整体安保状况”的提问,52.0%的受访者“感到不安”,而有高达70.3%的受访者认为“天安舰”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和军方的应对措施“不好”。¹有35%的国民不相信政府就“天安舰”事件所做的调查结果。对于“现政府对朝政策是‘天安舰’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的提问,54.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或基本同意”,而表示“不太同意或完全不同意”的只有17.3%，“半信半疑”的占28%。国民的这种反应,一方面表明越是对李明博政府执政表现持否定态度,就越是不相信政府发布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政府与国民之间所存在的沟通问题影响了韩国社会对“天安舰”事件的认识与态度。²

韩国国民安保担忧的增强,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政府应对与处理事件方式的不信任感。韩国国民对政府在朝鲜发动挑衅时没能立即采取适当的报复性措施而感到失望,而之后李明博政府在后续处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坚定与无能,让韩国国民更加对其不信任。

第三,对政府处理安保问题能力的不信任造成了韩国国民在对朝援助问题上的谨慎倾向。2010年7月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进行的“2010年统一意识调查”结果显示,38.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对朝援助,36.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增加援助。可见,认为应该减少对朝援助的国民占多数。至于“减少对朝援助的原因”,47.9%的受访者认为“朝鲜政府不能将援助物资如数发放给朝鲜民众”,21%的受访者认为“援助有助于延续朝鲜政权的统治”。对于“援助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朝鲜居民生活”的问题,55.2%的受访者认为不会对朝鲜居民的生活有所帮助,44.8%的受访者认为可能会有所帮助。也就是说,韩国国民在对朝援助问题上,希望维持或减少当前的援助水平,

1 “80%的国民认为‘天安’号事件是朝鲜所为”,载《朝鲜日报》,2011年3月24日。

2 这种逻辑可以用最近一家媒体的设问调查结果进行验证。对于李明博政府的国政运营评价,47.3%的受访者予以肯定的回答,45.4%的受访者给予“不好”的答复,毁誉参半。但对于与国民沟通的工作,62.5%的受访者认为做得不好。这种调查结果反应了一种国民的认识,即在施政中没有充分地反映并考虑到国民的意见。“李明博政府三年评价”,载《东亚日报》,2011年2月21日。

但都希望这些援助能够完全顺利地到达朝鲜居民手中。¹

而在大约一个月后实施的另一次民意调查也反映了上述倾向,韩国国民在对朝援助问题上的不满没有什么改变。韩国 KBS 于 2010 年 8 月 2 日至 3 日进行的“2010 年韩国国民统一意识调查”显示,对朝鲜政权“反感”的受访者达 61.8%,其中“非常反感”的为 31.9%，“有些反感”的为 29.9%。² 只有 21.6% 的受访者同意“无条件”对朝援助,相反,64.1% 的受访者支持“有条件地对朝援助”。在金刚山观光项目上,只有 15.8% 的受访者赞成“无条件地推进”,58.6% 的受访者支持“有条件地推进”。可见,韩国国民在对朝粮食援助问题和经济援助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对朝援助问题上的谨慎倾向表明,韩国国民开始对之前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政府的“和平繁荣”政策持批判立场,对南北首脑会谈的作用产生怀疑。

对于“南北贸易是否应与‘天安舰’事件挂钩”的问题,39.9% 的受访者认为“今后即使是小规模南北贸易也应该与‘天安舰’事件挂钩”,35.2%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挂钩”,24.9% 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大规模的贸易才应该与‘天安舰’事件挂钩”。这体现了“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国民在是否采取对朝经济制裁措施问题上分歧很大,也可以解读为韩国民众倾向于将政治/安保问题与经济问题进行区分处理。这种倾向在有关朝核问题与经济合作问题意识调查中也得到体现。在对朝援助问题上的谨慎倾向表明,韩国国民开始对之前金大中政府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政府的“和平

繁荣”政策持批判立场,对南北首脑会谈的作用产生怀疑。

第四,韩国国民的不安全感及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统一观。韩国国民认为,只有统一这种方式才能真正化解南北对峙状态,推进目前毫无进展的对话。根据韩国 KBS 在 2010 年 8 月 2 日至 3 日进行的“2010 年国民统一意识调查”,76.5% 的受访者关心统一问题,只有 23.5% 的受访者表示不关心;而在统一可能性的问题上,有高达 87.9% 的受访者认为“可能实现统一”,只有 12.1% 的受访者认为“不可能”,反映出国民对于统一存在普遍期待。但是,如果将统一与统一的负担联系起来,则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只有 28% 的受访者认为“一定要实现统一”,而 43% 的受访者认为“最好在没有很大负担的情况下实现统一”。³ 2010 年 7 月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进行的“2010 统一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统一的原因,43% 的受访者选择“同一民族”。24.1% 的受访者认为统一是“为了消除战争”,这一比例高于 2008 年(14.5%)及 2009 年(23.4%)

1 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统一学研究 8: 2010 统一意识调查”,2011 年 2 月, http://tongil.snu.ac.kr/tboard/view.php?id=pd01_1&page=1&sn1=&divpage=1&sn=off&ss=on&sc=on&sp=on&select_arrange=headnum&desc=asc&no=24。

2 KBS 南北合作企划团:“2010 年国民统一意识调查”, <http://office.kbs.co.kr/tongil/6218>。

3 同上。

的调查结果。

第五,韩国国民的安保意识增强,爱国意识和忠诚度大幅提升。《东亚日报》的调查显示,对于延坪岛炮击挑衅,完全同意“出动战斗机进行更强硬应对”的受访者达53.1%,基本同意的为30.3%。¹而对于“如果朝鲜再发动类似挑衅,我军如何应对”的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44.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动员超出对方数倍的军事力量,予以强硬惩戒”,45.5%的受访者则认为,“按照交战规则予以应对,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以防止全面战争的爆发”。这种调查结果表明,一部分韩国国民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感到不满,认为强硬应对很有必要,而另一部分国民则担心全面战争的爆发,希望慎重考虑大规模军事行动。

2010年6月,韩国国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受访者称如果爆发战争,将会参军或提供支持。²2010年11月6日国家报勋处进行的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称如果爆发战争,将会为国家而战。³一个月后的12月6日,一家地方媒体进行的调查结果也反映了这种安保观,68%的受访者表示如果爆发战争,将会参战;只有9%的受访者表示将会通过移民躲避战争。具体而言,71.6%的男性和64.3%的20多岁的年轻人有意参战。⁴

2011年新年舆论调查显示,58.7%的受访者认为“虽然担心朝鲜不断进行挑衅,但是应该不会爆发全面战争”,20%的受访者认为“基于韩国的国防实力和牢固的韩美安保同盟,不必担心爆发战争”,反映出大多数韩国国民认为战争不会轻易爆发。有分析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调查结果,主要是由于朝鲜没有针对韩国2010年12月20日的第二次延坪岛射击训练再次发动挑衅,朝鲜半岛的武力冲突危机暂告一段落。⁵而对于政府今后的对朝政策方向,47.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坚持当前的原则,直到朝鲜显示出弃核的诚意”,48.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取对话和妥协等稳健的政策”。这种对政府政策方向的认识已经明显有别于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不久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当时,有57%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强硬的对朝施压政策寻求根本性变化”,只有38.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通过南北首脑会谈或是派遣特使,从根本上寻求突破口”。

根据这些结果如果由此进行反推,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李明博政府未来没能确保其对朝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首先,李明博政府强化对美外交、努力恢复韩美同盟关系、消极应对“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等的政府行为已经使韩国国民对朝鲜和美国的认知认识产生很大变化。根据舆论调查,70.6%的国民对美国

1 “朝鲜延坪岛炮击挑衅”,载《东亚日报》,2010年12月2日。

2 “对朝敌视、对美友好的看法”,载《每日经济》,2010年6月23日。

3 “75%国民,如果爆发战争将会为国家而战”,载《首尔金融》,2010年11月6日。

4 该调查结果与国家报勋处的调查结果略有差别,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地方媒体进行的调查,另一方面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调查,见《每日新闻》,2010年12月11日。

5 “2011舆论调查”,载《东亚日报》,2011年1月3日。

持有友好感情,远远高于2008年59.9%的比例。55.5%的国民认为朝鲜是周边国家中对韩国安全威胁最大的国家。对于这种调查结果表明,可以认为韩国政府对于“天安舰”事件的消极不当的应对与处理给韩国国民的安保意识带来很大影响。

韩国国民对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也呈现一种矛盾状态,虽然希望通过南北对话和妥协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但对政府强硬政策的支持率在“天安舰”事件,特别是延坪岛事件之后一路上扬。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在2010年11月27日进行的“2010年年度悬案舆论调查”显示,64.8%的受访者支持对朝强硬政策,是稳健政策支持者(30.4%)的两倍。这种结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延坪岛事件给韩国民众心理带来显著冲击。¹而在此之前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3.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南北关系恶化”,对于恶化原因,74.4%的受访者认为“责任在于朝鲜”。²

朝鲜半岛局势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鲜的举动。无论如何,都应阻止在朝鲜半岛上出现因“先发制人”而引起的武力冲突事件,这也是所有周边国家的共识。无论朝鲜经历怎样的政权交替与外交孤立,都不应进行“先发制人”

朝鲜的挑衅导致南北爆发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李明博政府政治上需要继续维持对朝强硬政策,与此同时却要给国内高涨的“武力反朝”情绪“灭火”,这将是一个两难。

的武力挑衅。但是很多人,特别是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内部正处于政权交接的敏感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非常复杂,不排除未来由于政治斗争或是缓解内部压力的需要,朝鲜部分官员与军队将领对韩国采取过激武力行动,从而在朝鲜半岛引爆战争。在延坪岛事件后新上任的韩国国防长官一再强调,今后对于朝鲜的任何挑衅都不会再袖手旁观,将立即实施报复性应对措施。因此,朝鲜的挑衅导致南北爆发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李明博政府政治上需要继续维持对朝强硬政策,与此同时却要给国内高涨的“武力反朝”情绪“灭火”,这将是一个两难。

美国和日本在对朝政策上与韩国并无太大的分歧,这一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日、韩三国之间的沟通比较顺畅,它们在对朝政策上常能做到同气同声。

四、主要国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分歧

美国和日本在对朝政策上与韩国并无太大的分歧,这一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日、韩三国之间的沟通比较顺畅,它们在对朝政策上常能做到同气同声。韩、美、日三国在对朝问题上的共识在三国应对朝核试验、“天安舰”与延坪岛等事件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近期,三国在安保领域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强化,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2010年7月,日本四名海

1 见《朝鲜日报》,2010年11月28日。

2 见韩国国家安全网(Konas net),2010年10月20日。

上自卫队军官首次观摩了在东海举行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同年10月,日本护卫舰和P-3C预警机参加了首次由韩国主导的在釜山附近海域进行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演习,这是韩国独立以来,日本自卫队舰艇首次进入韩国海域参加军事演习。¹在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韩国海军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美日联合军事演习。

总的说来,美、日、韩三国均希望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但在处理当前朝核危机的具体做法上,各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

美国试图通过主导各方的合作与协商来解决朝核问题,并希望借助日本和韩国的力量来遏制朝鲜。日本则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军事活动范围。2010年12月11日,日本首相表示,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事,将会介入并给予美国援助。²此番表态的根据便是2005年日美共同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修订后的宣言旨在强化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³美国也有强化对日军事合作的意愿。比如,2010年12月8日,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表达了对日本参与韩美军事演习的强烈期待,⁴并称将会同日本自卫队高层就此

美国试图通过主导各方的合作与协商来解决朝核问题,并希望借助日本和韩国的力量来遏制朝鲜。日本则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军事活动范围。

进行协商。⁵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朝核问题、“天安舰”与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地区安保局势日益紧张,愈加不可预测,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了与韩日两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朝鲜半岛出现剧变时,为确保前沿部署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美军须使用驻日基地,韩日间《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⁶此外,韩日间的军事协定也符合美

1 “韩日军事交流的新范畴?”载《世界日报》2011年1月4日。

2 菅直人首相针对在朝鲜半岛有事时保护本国在韩朝两国侨民的相关言论,“想出动自卫队运输机救出本国侨民,但(日韩)两国间没有确定相关的规则,有意与韩国就安全保障问题开始进行协商,使两国安保合作取得一定进展。在出现不测的情况下,应该能够出动自卫队救出被绑架日本人,为此,(日韩)两国应该就相关问题进行明确。现在正在推进几项相关协商”。但是,韩国政府对此进行否认,“没有进行过相关协商,也没有提出过相关议题”。菅直人首相的想法是在一天内营救出在朝鲜的10余名被绑架日本人与在韩国的28000余名日本人。菅直人首相的此番言论是在与被绑架日本人家属见面后的第二天做出的,因此很多分析认为这种言论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目的。对于日本的这种设想是否属实尚未得到确认,但是是一名韩国国会议员披露,在201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中,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曾就该问题进行过讨论。“菅直人:考虑朝鲜半岛有事时派遣自卫队”,2010年12月13日。

3 “日本有意就强化防卫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载《世界日报》,2010年12月12日。

4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强烈希望韩日间进行军事合作,见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2010。

5 “中国对‘韩美日是军事同盟’反应敏感”,载《明日新闻》,2010年12月14日。但是美国和日本专家认为,在朝鲜半岛出现剧变情况时,日本派遣自卫队的行为是违宪行为,即只有在先行修订日本和平宪法和自卫队法,并与韩国达成相关军事协定后才有可行性,见“菅直人首相‘向韩国派遣自卫队’的言论是违反法律没有可行性的言论”,载《文化日报》,2010年12月14日。

6 “韩日国防长官强化军事合作”,载《亚洲经济》,2011年1月10日。

国在东北亚推进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构想。¹

对于强化韩日军事合作，韩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韩国军方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国防部曾就推动与日本签订《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和《军事秘密保护协定》表示，“美国与韩国、日本与美国之间都签订了军事秘密保护协定，只有韩日间还没有签署，现在韩日两国都认识到签订该协定的必要性”。² 上述协定将推动两国建立共享朝鲜核武和导弹情报的制度化基础。³ 但是，韩国普通国民和舆论将韩日两国军事合作问题与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两国间一系列较为尖锐对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现在推进韩日军事合作为时尚早。似乎是意识到这种民间倾向，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在接受一家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安保领域，两国只是在营造切实有利于两国展开对话的氛围”，“并没有提出过建立韩日同盟关系的问题”。⁴ 虽然日本还希望借朝核危机与韩国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但由于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韩国对日本缺乏信任、存有戒心，因而只希望通过韩美军事同盟来威慑和打击朝鲜，而并不希望日本对朝鲜半岛有过多的军事干预。

虽然日本还希望借朝核危机与韩国加强军事交流与合作，但由于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韩国对日本缺乏信任、存有戒心，因而只希望通过韩美军事同盟来威慑和打击朝鲜，而并不希望日本对朝鲜半岛有过多的军事干预。

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处在数个三角关系中，需要搞平衡外交，韩国政府对此能够理解。但是，韩国政府仍希望中国政府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

最后，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处在数个三角关系中，需要搞平衡外交，韩国政府对此能够理解。但是，韩国政府仍希望中国政府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首先，中国可以做出更大的外交努力，将朝鲜重新拉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目前朝鲜对“天安舰”与延坪岛事件比较敏感，如果中国能够说服美国，并共同向朝鲜保证，这两个事件将不会成为六方会谈的议题，那

1 “韩日军事交流的新范畴？”，载《世界日报》，2011年1月4日。

2 “韩日军事合作不会增加安保危险”，韩国联合通讯社，2011年1月5日。

3 《相互军需支援协定》(ACSA)是指在灾难营救、联合国维和行为中相互提供军需品和服务方面的支援；《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是指两国共享关于朝鲜核及大量杀伤性武器的相关情报。韩国当前已经与美国、俄罗斯、越南等21个国家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美国、泰国、新西兰、土耳其、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等8个国家签订了《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参见“日本期待防卫相时隔六年的访韩”，韩国联合通讯社，2011年1月9日。日本于1996年与美国、2010年与澳大利亚签订了《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现在希望与韩国签订第三个《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参见“韩日强化军事合作”，联合通讯社，2011年1月4日。

4 “韩日安保同盟？”载《媒体今日》，2011年1月6日。

5 对于强化韩日军事合作问题，韩国国防部持一种“转向性”的立场，但青瓦台和外交通商部仍持慎重态度。参见“日本期待防卫相时隔六年的访韩”，韩国联合通讯社，2011年1月9日。韩国国防部政策室室长在接受广播采访时披露了国防部关于渐进性、阶段性地推进韩日军事合作的立场。“将在妥善控制幅度与深度的情况下推进与日本的军事合作”，韩国 YNT 新闻，2011年1月7日。

么朝鲜重回六方会谈的可能性将会非常大。其次，对于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合作，韩国乐观其成。但是，韩国希望中国的对朝政策能够改变一贯坚持的“政经分离”原则，希望看到中国增强对朝鲜政治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可以经济上的援助与合作来作为交换条件，使得朝鲜在朝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最后，中韩双方应加强沟通对话，增强互信。例如，当前美国建议，六方会谈如果无法重开，可将朝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讨论，韩国政府将会考虑接受美国这一建议，但中方肯定不会接受这一建议，因而中韩需要就此多做沟通。

（李琪 译；朱宰佑 校）